



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

——
《华夷变态》初探

孙文 著



商务印书馆

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

——《华夷变态》初探

孙文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 / 孙文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ISBN 978-7-100-08453-6

I. ①唐… II. ①孙… III. ①国际贸易—贸易史—史料—研究—江户时代—中国、日本 ②对外贸易—贸易史—史料—研究—江户时代—中国、日本 IV. ①F7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40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

——《华夷变态》初探

孙文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453-6

2011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7/8
定价：21.00 元

总 序

在通常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中日文化交流史”一般归入“专门史”门类，但其本质应当属于交叉学科，不仅其外延覆盖中国史和日本史，其内涵还涉及思想、宗教、法制、民俗乃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地位尚不甚稳定，然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均有深厚的积淀。总体上说，日本起步较早，成果也颇丰硕；中国急起直追，点面均有突破。

日本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首推辻善之助的《增订海外交通史话》与木宫泰彦的《日华文化交流史》，虽都成书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依然不失为经典，尤其木宫泰彦的著作经胡锡年汉译，成为众多中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其次是森克己围绕“日宋贸易”的系列作品，即《日宋贸易之研究》、《续日宋贸易之研究》、《续续日宋贸易之研究》、《日宋文化交流之诸问题》，以网罗史料齐全见长；再则是田中健夫，成果集中于元明时代，如《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中世对外关系史》等，继承森克己学脉而多有创新。除此之外，实藤惠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庭修的中日书籍交流、池田温的中日法制交流、小曾户洋与真

田柳的中日医学交流等研究，均有开拓之功。近十余年来，更呈群贤辈出之势，如森公章、山内晋次、榎本涉、河野贵美子等，各有建树，令人刮目。

回观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抗战硝烟中，虽偶有吉光片羽的佳篇力作，如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等，但基调一直比较低迷；新中国成立后，硝烟已散，敌意未消，此门更趋凋零。迨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才渐成气候。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交叉学科特性，涉足该领域的学者也颇庞杂，除了日本学专家，专治国学各科专家也参与其中，依托各自学科领域的深厚功底，急起直追，以致短时间内后来居上，在局部点面屡出新意。

如在文学领域，严绍璁《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堪称珠联璧合，开创中日文学交流史新生面；在考古分野，王仲殊围绕“三角缘神兽镜”撰文著书，提出“东渡吴人制镜说”，震撼东瀛；于人物专题，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沈殿忠等《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拉近了与日本学界的距离；哲学思想方面，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日中儒学之比较》不拘旧说，创意间出；书籍交流方面，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等，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尤其架构“书籍之路”理论备受关注；古代史有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等，均有日文版问世；近代史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等，颇得学界好评。此外，在港台地区，郑梁生的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高明士的隋唐东亚教育圈研究、谭汝谦的中日书籍互译研究等，均独树一帜，不可忽视。

如上所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涉及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日本虽然起步较早,但论者多依据本国文献史料、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拘囿于传统史学观念,所以涉及日本大抵考证精当,事关中国或多语焉不详。中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主要有两点:涉足此门的学者基本上精通日语,又能读懂艰涩的日本古代汉文史料,语言优势为其一;在吸收日本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对传统的学说或观点加以佐证或修正,继而提出新见解,史料优势乃其二。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学界虽起步较晚,但近数十年来进步神速,在某些点甚至面,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前述许多学者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发行,以及王仲殊获“福冈亚洲文化赏”、严绍璦获“山片蟠桃赏”、王晓平获“奈良万叶世界赏”、严安生获“大佛次郎赏”等日本重要学术奖项,说明该领域的中日学者,已经进入平等切磋的新阶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周一良、严绍璦、王勇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本问世,该丛书由中日双方各20余位知名学者执笔,同时在日本发行日文版,该丛书荣膺“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学术类图书金奖,堪称中日学者联手营造这块学术园地的结晶。

本丛书聚焦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既顺应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各位作者归属的学术团队的小背景,在这里有必要作个交代,以助读者了解每部作品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研究渐趋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人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8年该中心随“四校合并”而改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遂在“中国古代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博士生;2004年本人因故调离浙江大学,8名博士生最后挂

靠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完成学业。

1989年创建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际，我把研究重点定位在“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并以开放模式运作科研项目，广邀国内外同道合作攻关。这些成果大多汇入《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奈良平安时期的日中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诸书，先后在国内外出版。

我在浙江大学培养的8名中日博士生，虽然各自的专攻年代不同、侧重的领域相异，但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文献史料。回忆陈年往事，每周举办“读书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桌子上堆满各类字典及参考文献，然后一字一句注释中日文献的相关史料，这些虽然看似枯燥乏味，但因此打下比较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看到日后这批学生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当年的辛劳也不再觉得苦涩。

自从2000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算来时光已经流逝了10个春秋，现在他（她）们大多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在国内外高校独当一面。虽天各一方，但学脉相承，学术上的交流愈趋频繁，擘画这套丛书可谓水到渠成。然以“新视域”括之，我想大概以下几条可作依据。

首先，本丛书纵向由隋唐及宋元再至明清，每个朝代均有专著，上下衔接，自成体系；横向则涵盖历史、宗教、文化、教育、贸易诸分野，展现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姿。

其次，作者均精通日语，对日本学者的成果细心咀嚼，经过吸收与扬弃，依托国学底蕴、立足中国史观，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识。因此，这些著作即使放到日本学界，相信也不会逊色。

再则，作者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学训练，对书中引用的大量中日古代汉文史料，不仅在断句、训字、释词诸方面用力颇勤，在文

意的诠释、史料背景的推断上也有创见。

还有，整套丛书虽聚焦于“中日”，但作者视野多兼及东亚，在东亚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追踪中日文化交流的历程。从传统的文化双向交流研究，进化到区域文化环流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

最后，各卷作者均有在日本长期留学或执教的经历，受到中日两国学术氛围的熏陶；而且，他们在攻读博士期间，辗转于“历史学”和“文献学”两个学科，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双重的学科背景来研究这个跨学科的主题，相信会有独到的发见。

本套丛书初拟八卷，即隋唐两卷、宋代两卷、元代一卷、明代一卷、清代两卷，虽然总体上由隋唐而明清，似乎串接成一部中日文化交流通史，然元明时代略显单薄；加之各卷的主题也未能一以贯之，如隋唐部分偏重于书籍与人物，宋元明部分围绕佛教，清代则以教育和贸易为主。我们这个团队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便是合作撰写断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通史，届时或可弥补本丛书留下的缺憾。

这套丛书若能给读者传递“新视域”的些许愉悦，给“中日文化交流通史”领域吹入几丝新鲜气息，则所愿也。

王 勇

2010年11月30日

凡 例

一、本书所据《华夷变态》版本为：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全三册），东京：东方书店昭和五十六年（1981）再刊“东洋文库丛书第十五种”本。又浦廉一所作《华夷变态解题》置于《华夷变态》第一册卷首，自起页码，本书凡引浦廉一解题中的观点或文句，均略称《解题》，并标示该解题中页码。

二、本书所有引文中“[]”内的文字均为原文旁注，或双行小字注释；“()”中的文字，除特别说明者外均为笔者所注。

三、中国古代及日本年号均使用中文数字，并于首次出现时加括公元纪年。叙事或引用史料中出现中国或日本纪年时，若为中方史料或事件，则以中国纪年加括公元纪年，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若为日方史料或事件，则以日本年号加括公元纪年，如“贞享元年（1684）”。中日史料中的年月日，均为阴历，行文、引述史料中的时间表述一仍其旧。

四、有关专有名词（人名和地名等）一般遵从史籍中的表述，如“万丹”、“咬溜吧”等，还有如“阿兰陀”、“唐船”、“唐人”、“南蛮”

等，均照原文献表述，如非必要，不事变更。又引用日文文献及其汉译本时，作者姓名遵从所据版本的表记。如日本学者“大庭脩”之名，其著作之中文译文分别有写作“大庭脩”和“大庭修”者，本书从所使用刊本的表记，未事统一。

五、行文中引用风说书或其他日文文献时，正文中一律译作中文。如“六十七番山東船之唐人共申口”，译写作“六十七番山东船之唐人口述”。唯对原文标题进行讨论——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在讨论“风说书命名规则”时，则按原文形式写作“貳番福州出し船の唐人共申口”。

六、本书采用简式脚注，凡援引中日文文献，只于页脚注释中标示作者名、文献名及引文或参见卷次、页码等。出版机构、版次等请见书后参考文献目录。又脚注中出现的日本学者姓名、书名、期刊名、出版机构名等一般也改写成中文简体字（部分异体字除外，如“脩”），唯个别论文名称依原文刊出，以便检视。

七、本书使用简体字排版，但是专有名词如“咬嚙吧”的“嚙”等字，除在表格中无法使用造字外，正文均按史料原文字体。又，日文史料中的“脇船頭”一词，国内学界有译作“协船头”者，然本书为体现风说书的表记习惯，只改为简体汉字表记作“肋船头”。

八、为行文简洁，书中称引前修时贤之说，皆直书大名，不赘“先生”字样，敬请谅解。

目录 Contents

序论 1

-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的提出 1
- 二、研究史的回顾 6
- 三、风说书的史料价值 22
- 四、研究角度与方法 29
- 五、关于几个用语的说明 31

第一章 林氏父子与风说书 35

- 第一节 林春胜及其家世 36
- 第二节 《华夷变态》与《崎港商说》 48

第二章 风说书与唐船 75

- 第一节 “唐船风说书”的缘起 76
- 第二节 赴日商船之数量 96
- 第三节 赴日商船与人员 120

第三章 《华夷变态》的时代 140

- 第一节 风说书中的欧洲商船 141
- 第二节 南明政权与日本乞师 161

第三节 “长崎存银”与郑氏一族的对日贸易 …… 177

第四节 风说书与“三藩” …… 194

第四章 《华夷变态》与“唐船贸易” …… 212

第一节 山东的对日贸易 …… 213

第二节 江苏的对日贸易 …… 222

第三节 浙江的对日贸易 …… 230

结语 …… 235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239

附录 1674—1728 年间赴日商船数量统计表 …… 251

后记 …… 258

序 论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的提出

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1603—1867）的日本都实行某种程度的海禁或锁国政策，这正是海外贸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之一。

明末国运衰微，遭逢乱世，一向以“朝贡”名义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亦告式微。清初国内局势动荡，清政权倾全力平定沿海复明势力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抵抗与叛乱，一时无暇顾及恢复与重建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而且严厉实施海禁，试图阻断内地民众与沿海敌对势力的联系。但是，以私人商船为主体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却在种种限制下逐渐壮大，成为清初对外关系的主流。^[1]

江户时代的日本严禁本国国民出海，因此绝少日本商船赴海外贸

[1] 私人奔赴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流，乃是明中晚期以来中外贸易的新趋势。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易。^[1]完全依靠外来商船的海外贸易被严格地限定在长崎一地，贸易的对象为中国、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荷兰等个别西方国家。日本学术界用“长崎贸易”来指称江户时代发生在长崎的对外贸易活动。

本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清初中国（也包括东南亚华侨）商人的对日贸易——长崎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唐船风说书，这是对到达长崎港的中国商人进行询问之后记录下来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国内时局、东南亚各国情况的报告。因其询问对象为“唐人”，所以也叫“唐人风说书”。已故日本学者大庭脩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云：“所谓‘唐人风说书’，是指唐通事经询问入港唐船船头后写成的报告书。其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形势、他国形势、航海情形、船头与其役人情况、乘员情况等。报告书写成后，必须提交给长崎奉行，再由长崎奉行向江户报告。”^[2]风说书要上呈江户幕府，其性质在当时属于机密文件。大部分风说书经江户幕府儒官林春胜（1618—1680）及其子林信笃（1644—1732）编辑，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结集后的风说书，仍作为“罕传之秘籍”，虽“间亦有传抄本流传于外”^[3]，但民间人士实难寓目。直到1958年，这两种资料集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等整理（校订编纂，浦廉一逝世之后，由中村质等续完）^[4]，作为“东洋文库丛刊”之第十五种以排印本的形式

[1] 江户时代的锁国是通过幕府颁布的一系列相关法令逐步实现的。1633年颁布最初的锁国令，随后于1634、1635、1636、1639年又相继颁布一系列的锁国令，旨在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和限制外国商船（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船）的贸易。请参看〔日〕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第19—20页。

[2]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21页。

[3] 谢国桢编：《增订晚明史籍考》，第994页。

[4] 浦廉一博士于1957年12月27日病逝，未能看到《华夷变态》的出版。

面世。其内容包括内阁文库本《华夷变态》三十五卷和《崎港商说》三卷，并利用岛原市立图书馆松平文库本《华夷变态》和内阁文库藏“长崎御用留”中的相关记录补充了若干资料。以三巨册另附一册补遗的形式首次刊行的《华夷变态》，无疑在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开启了一扇通往史料秘藏的大门。

1981年，日本东方书店限定发行150部，出版了《华夷变态》的再刊（第二版）本。该刊本在东洋文库初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中村质从山口县文书馆藏“毛利家文书”中发现的若干资料，以及大庭脩发表的“岛原松平家本唐人风说书”。这个再刊本号称搜罗了现存所有与“华夷变态”有关的资料。本书的研究即根据这个再刊本^[1]进行。

历史科学的研究有赖于史料的保存、整理、公开和科学地使用，史料的性质及其价值直接影响着历史研究的结论。《华夷变态》因其所录风说书是日本在锁国时期以来自海外的商船为对象采录的口述资料，内容广泛而且多是船员的亲历亲见，具有较高的时事性和真实性，在清初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浦廉一在《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中所说：

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风说书来看，其大部分也绝非街谈巷议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时一并提呈诏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绝不可轻视其史料价值。而且即便是街

[1] 东方书店的再版本补充了新发现的资料，堪称完备，但因其主体沿用了东洋文库初版本的内容，因此本书在行文中称引这个版本时，在无特别必要的情况下，使用“东洋文库本”或“整理本”的省称。

谈巷议之类，也具有其相应的史料价值。^[1]

对明清史料搜辑颇勤的谢国桢是较早对《华夷变态》作过评述的中国学者。他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对《华夷变态》作了解题，云：“是书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吾国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群岛吕宋、咬嚙吧（Vatavia，今天的印尼、爪哇一带）、和兰（今天的荷兰）各国船只，来往长崎，其通事即调查其情况，征收税额，防止金银流出，加以限制；并将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据以汇报政府。”并进一步判断“是项资料主要为唐船风说书，并杂以和兰陀风说书，其中所记者多为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2]。并指出：“清乾隆间严文网之禁，藏吴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俨然具在，不可不谓珍本，且其他海外诸风说，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资料也。”^[3] 谢国桢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对《华夷变态》流传的几个版本作了简略的介绍。

但是，谢国桢的论断是根据早期流行的一个五卷本《华夷变态》得出的，从目前通行的“东洋文库本”所提供的资料来看，他的结论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改。因为大多数风说书的内容并不是“多为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更多的是“各地消息，海外风

[1] 《解题》，第 71 页。

[2] 《增订晚明史籍考》，第 994 页。

[3] 同上，第 995 页。

说，传闻之辞”。^[1]虽然其中包含有太多的敷衍不实之词，甚至还有许多荒诞不稽的奇闻逸事^[2]，对于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状况的反映却是多方面的。因此，前引大庭脩的看法更为全面，也比较符合风说书的事实情况。

继谢国桢之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周一良也曾指出《华夷变态》的重要价值并期望史学界能将其译介到中国来。^[3]

如前文所述，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程度不等的海禁或锁国政策，两国之间虽无正式邦交，中日交流却不曾断绝，而且成为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输出的第三次高潮^[4]，而促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中国沿海地区赴日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船。

[1] 事实上，谢国桢所谓“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的论断，既不是他考察了五卷本《华夷变态》之后得出的——因为，这与五卷本的内容不相符合，也不是他对现存所有风说书进行全面考察之后得出的，而是借用了林春胜《华夷变态·序》中的表述。

[2] 例如卷十五“百七十五番南京船之唐人共申口”有：“（康熙二十七年）今年二月，从右述之河（笔者按，指流经扬州府高邮的高邮河）底挖出三个小铁箱，则开箱视之。其一内有顺治年号之钱十八文，另一内有康熙年号之钱二十七文。最后一个未打开，欲砸开，然亦未能砸开，故不详其内之情形。然此事显然……顺治十八年而改元，康熙当年亦为二十七年，乃右所述箱中所有之钱数也。”（第 1022 页）云云。又如卷十四载“六十七番宁波船口述”提到浙江山阴县有金氏妻，一胎生五子，“三男二女，与寻常人异，色殊黑，成奇态”，还说此事乃“古今之稀有事”，因此惊动官府云云。（第 903 页）此类风说，或反映时代民心，或涉荒诞无稽，然皆关系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及民风民俗，自应受到重视。诚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云：这些历史中的“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有时候，几桩传闻轶事足以使某盏信号灯点亮，为我们展示某些生活方式。”（见所著《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7 页）

[3] 周一良：《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 321 页。

[4] 参见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第六章“中国文化第三次大摄取”一节的论述。（第 197—248 页）